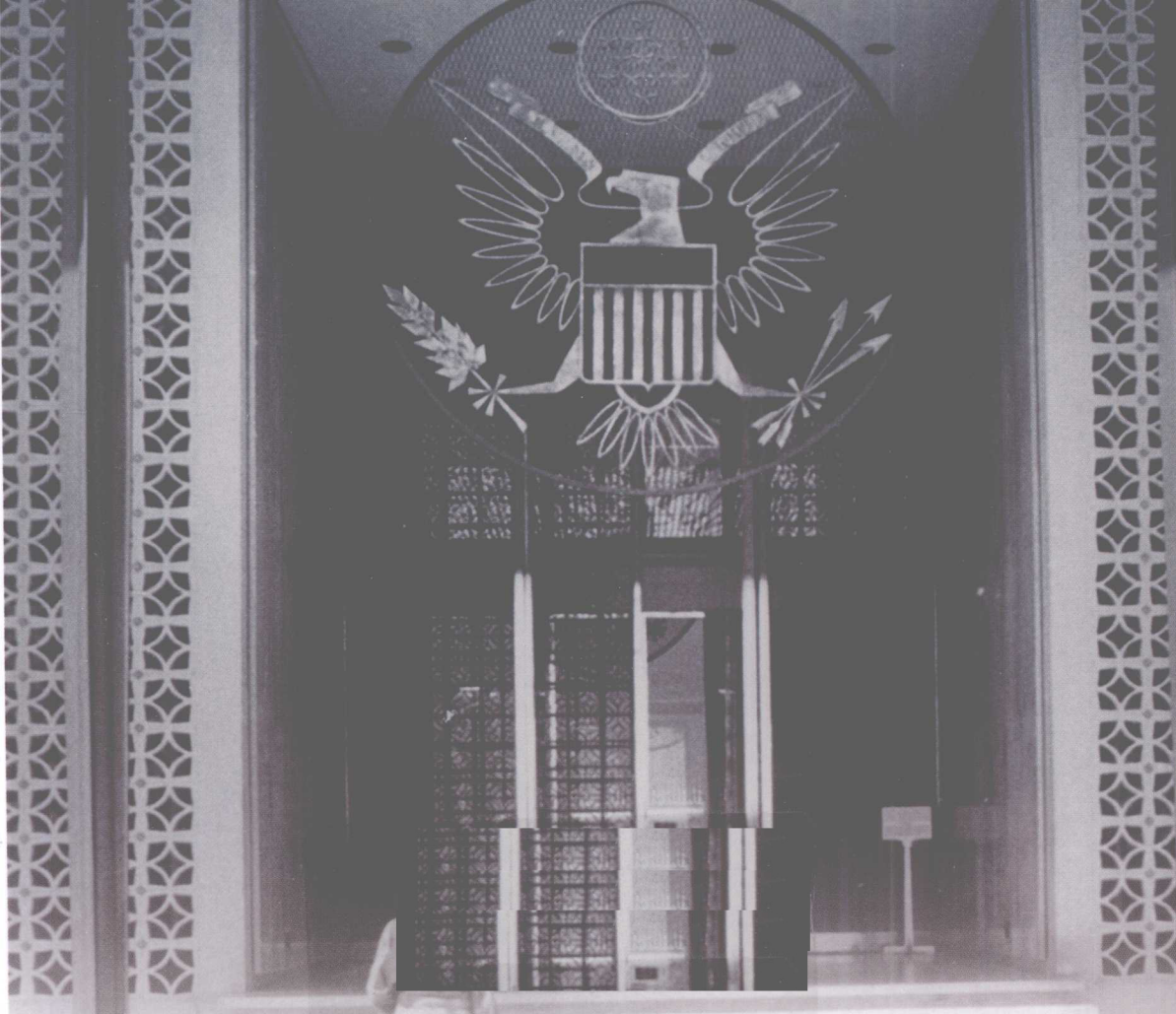




The Architecture of Diplomacy
Building America's Embassies

外交与建筑

——美国海外使领馆建造实录

[美]简·洛菲勒 (Jane C. Loeffler) 著

袁海滨 译

赵雪澜 校

 中国财经出版社

外交与建筑

——美国海外使领馆建造实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交与建筑: 美国海外使领馆建造实录/(美) 洛菲勒著; 袁海滨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8

书名原文: The Architecture of Diplomacy: Building America's Embassies
ISBN 978 - 7 - 5095 - 1319 - 4

I. ①外… II. ①洛…②袁… III. ①大使馆 - 建筑史 - 美国
IV. ①TU24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8669 号

责任编辑: 吴 敏

责任校对: 张全录

封面设计: 九州博雅设计室

版式设计: 李香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9 印张 36 插页 324 000 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8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319 - 4/F · 1118

图字: 01 - 2009 - 083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序

使馆是特殊类型的建筑。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它们关乎国家的核心利益，负有特殊的功能和使命。使馆的形象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外交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使馆是重要的建筑。使馆的建造要满足外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需求，保证人员和财产安全；使馆的建造代表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反映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其象征意义之巨大，远非一般类型建筑所及。

使馆又是常常被人忽视的建筑。它们远离国土，又和普通大众的生活相去甚远，人们往往想不起它们的存在，即便是出国旅行，也很少有人会把使馆当作既定的游览目标。正因为如此，使馆往往成为神秘的建筑，它们的形象鲜为人知，它们的建造不被关注，它们的格局封闭严密，很少有人了解使馆是什么样子，普通百姓如此，绝大多数职业建筑师亦是如此。

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加上安全等特殊因素的制约，使得长久以来，针对使馆建筑的研究敏感而困难，对使馆建筑独有的外交内涵更鲜有著述，美国如此，中国亦是如此。本书是一部全面揭示美国使馆建设历程的专著，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强悍活跃的国际形象，使得对其使馆建筑的解析非常令人期待。该书以外交为背景点评建筑，从建筑的角度解读外交，对各个时期代表性的美国使馆建筑风格和建筑形态进行了充分论述，对围绕使馆建筑的外交风云进行了回顾，为读者勾画了外交与建筑这两个领域的交集。

本书译者袁海滨是我院 2002 届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硕士毕业

生，他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是我院名誉院长彭一刚院士。毕业后他进入外交部从事我国驻外使馆的建设管理工作，并在美国工作多年，参与了驻美使馆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馆舍建设工作。建筑学专业的知识背景加上使馆建设的亲身经历，相信他可以准确把握和充分展示原著的内涵。作为院长，很高兴看到他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研究成果，也期待不断有更多校友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使馆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据我所知，许多校友曾经或正在参与中国使馆的设计工作（如崔愷主持设计的中国驻南非新使馆就刚刚落成）。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的驻外使馆建设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希望越来越多的优秀建筑师，特别是我们的校友，积极投身这项事业，提高中国使馆建筑的品质和影响力，同时希望中国使馆建筑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



张 颀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文版序

致中国读者：

本书首次出版后世界即经历着剧烈变动。就在1998年夏本书出版后的几天，恐怖分子袭击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使馆，造成220多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这些袭击对使馆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克罗报告》在评估上述爆炸袭击的责任时，特别指出外交机构均缺乏足够的安全防范，再次呼吁大规模重建那些易受攻击的使领馆。美国驻外机构评估小组在独立进行的一次评估中，检查了美国国务院设在全球范围的使馆，发现许多使馆，包括驻华使馆，都不够安全，而且过于拥挤、陈旧。

作为对上述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国会设立了一项长期的、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旨在重建180个海外使领馆，并且在1999年通过了《保障使馆建设安全和反恐法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建筑退线100英尺的规定，同时强制要求各驻外部门建在同一块地皮内。为更好地完成不断扩展的建设任务，2001年国务院将外交建筑局(FBO)改组为海外建设局(OBO)。“9·11”事件使升级美国驻外机构安防能力的需求变得尤为紧迫。

在2001—2008年这短暂的七年间，海外建设局在全球范围新建成56个使馆，并有34个以上的项目在建，包括高墙壁垒环绕下的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和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使馆建筑群。为加快建设步伐并控制成本，从2003年至今，海外建设局创立的新的“标准化美国使馆设计”成为美国驻外机构的统一形式，这些设计被应用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马里首都巴马科和

喀麦隆首都雅温得的新使馆。

这些将是今后数十年最主要的使馆建筑类型。它们标志着美国在某一方面对国际参与做出了务实的退让和后撤，但在其他方面则承担着更加持久的责任。如何看待这些新使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想从建筑中解读出什么。

诚然，并非每一座新使馆都遵循标准化设计的要求，美国驻柏林和北京使馆就是鲜明的特例。两个项目的建筑师都是通过设计竞赛产生的，方案都很明显地适应当地具体环境。柏林使馆由 MRY 公司设计，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巴黎广场，邻近勃兰登堡门。北京使馆建筑群由 SOM 公司设计。两座使馆均于 2008 年落成。

事实证明，标准化使馆设计的时代或将很快结束，至少海外建设局已经开始计划将工作重心更多地转移到出类拔萃并具有持续性的设计上，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让美国驻外形象更典型且更平易近人。

作为对承认美国文化资产所做的一种努力，美国国务院在 2000 年创立了“重要文化价值房产登记制度”。已列为历史房产的包括伯士官（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官邸）和玛格丽塔官（罗马使馆办公楼）；同时，还列入了爱德华·斯东设计的新德里使馆办公楼，这是一座 20 世纪 50 年代（我形容这一时期为使馆建设的“全盛期”）的标志性使馆建筑。登记造册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因为海外建设局已经计划取代本书中介绍的一些现代主义大师设计的重要使馆，像埃罗·沙里宁设计的伦敦和奥斯陆使馆、马塞尔·布劳耶设计的海牙使馆，而哈里·维斯设计的阿克拉使馆已经被取代。因此，记录下那些曾经对树立美国海外形象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使馆建筑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从未打算写一本有关安全的书，但在本书中，安全主题很自然地凸显出来。我写此书的初衷是记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建设项目的历史，记述在冷战高峰期那些象征美国民主和理想主义却又常被人

们忽视的建筑。为更好地理解建筑，我选择从政治角度加以研究。读者能从此书中觅得有用之处令我深感满足。美中两国近期在北京和华盛顿落成的大使馆是两国关系重之又重的最佳证明。我很高兴本书终于得以和那些希望更多地了解使馆建筑及其独特历史重要性的中国读者见面。

简·洛菲勒

2008年10月12日

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英文版序

参观华盛顿新落成的芬兰驻美国使馆，让我联想到二战后早期的美国使馆建筑那些备受关注的特质。芬兰新使馆位于副总统官邸对面的使馆区，在邻近的多座外表庄重的外交建筑中绝对引人注目。绿色的玻璃幕墙建筑由紫铜、青铜和高度抛光花岗岩装饰，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树木，正立面的金属格架覆盖着鲜花盛开的藤蔓。这座极为精致的建筑由芬兰建筑师米科·海基宁和马库·科莫宁设计，被喻为“耀眼的珠宝盒”，在1994年开馆时，人们称赞它为地标性建筑。此后，华盛顿人争相希望能获邀参观这座与众不同的新建筑——享受从它玻璃幕墙内探望出去的景致，沿宽敞的中央楼梯拾级而下，坐在奇异的帆布雨篷下，探寻久负盛名的桑拿浴。所有人都认同这座建筑体现了芬兰的外交“成功”。游览过新使馆的人都会立刻意识到芬兰是个完全现代的国家。新使馆的每一细节都体现着高科技，令人惊叹于芬兰的施工工艺和卓越的设计水平，它所起到的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完全可以取代一大堆宣传册、书籍、电影、旅游海报以及交流项目。

与芬兰新使馆扮演着芬兰艺术和文化展示场的作用相同，美国使馆也是美国艺术、文化、政治理念的展示场。参观芬兰新使馆让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参观美国使馆的感觉，那时开放性既是设计的首要追求，又是外交目标。20世纪60年代中期，使馆项目感受到变化的、更具威胁性的世界的影响，设计重心转移。1964年落成的美国驻都柏林使馆是最后一个能让建筑师将设计本身置于影响使馆建筑的诸多因素之外的项目。

美国使馆和大多数国家使馆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 1954 年首次提出的一项政策，即美国使馆应该“融入”并反映其所处的环境。尽管在华盛顿新建的外国使馆没有刻意表现“美国化”，但美国建筑师却在使馆设计中努力捕捉遥远驻地的“异域特色”。一些美国官员不切实际地认为有必要如实表现驻地特色，因为这样的使馆建筑能赢得驻在国的认可。同时，他们还想避免美国使馆纯粹是“外来品”的指责。造成美国建筑师关注当地建筑（如泰姬马哈陵）的另一个原因是，建筑师和艺术家一样，总是在探寻创新的途径，最敢于把自己的职业命运建立在大胆的设计上。这些因素和其他一些因素混杂在一起，使对建筑含义的解读变得复杂化。

本书旨在为今后研究外交建筑及其历史提供基础。它为许多争论提供了素材，包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热议，以及美国外交建筑项目是否是一种统治手段等。有人会说美国主张“融入”当地环境的政策是对自己世界强国状态感到不安的真诚或自觉的表现，当然肯定也有人会说这一政策只不过是一种轻视他国、视别人的文化如主题公园展览的傲慢表现。如果建筑真的是国家实力的展示，那么外交建筑项目的确是一种征服的方式，但没必要带有威胁性，也不应该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预先设定的方式太幼稚了。正如书中所写，政府内外许多人都对外交建筑项目进程施加各自的影响。而且，如果说输出（电影、时尚、外援）是文化征服的组成要素，那么输入（石油、汽车、电脑）也同属一类。有些输出对国家利益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些不是。

在研究美国使馆建筑含义的过程中，我试图透过表面探寻制约建筑形成的政策和程序。使馆建筑的业主并不是一位，而是很多位，建筑含义随不同业主的声音而异。例如，1969 年落成的由山崎实设计的波士顿洛根机场东航航站楼，与众多美国使馆建筑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见图 54）。《波士顿环球报》评论员罗伯特·坎贝尔形容它是“自负和愚蠢的建筑”，是传达“自恋主义”的“傲慢”声明

(1993年8月13日)，但他并非指整个波士顿都是傲慢或自恋的。同样，对整个国务院做出评价也是困难的，更不要说美国政府或人民对使馆建筑的不同理解了。使馆建设的整个历史还是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地方。

除了增添争论的素材外，我还希望本书可以促进对使馆建筑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一领域还有许多有待探索的空间。对韦恩·海斯的历史评价将是有助的，前国会议员弗朗西斯·博尔顿、约翰·鲁尼、索尔·布鲁姆也值得研究，还有那些我们知之甚少的建筑师们。可现实情况是，没有几位建筑师留下了传记，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并且此类传记更关注建筑作品而非建筑师的人物个性，这同样也是种缺憾。对财政部建筑监督员办公室和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历史研究都正在进展之中，这些都将受到欢迎。

使馆是否应受到保留政策的庇护也关乎国家利益。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换，改善安防的合理需求也在改变或影响着使馆建筑，外事经费的相对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以出售现有使馆来资助新建项目的需求，使得将使馆建筑作为历史成就加以“保留”的努力没有了意义。但它们是美国的历史建筑，它们确实需要得到这样的承认。在更多的使馆被出售、流失或遗弃之前，至少应对它们进行记载。这样，国务院才能保存住这段历史，今后的历史学家也才能得以更好地解释外交的这一领域。

致 谢

假如我父亲不是建筑商，我也许不会对建筑如此痴迷。正是目睹了他在波士顿及周边地区的建设项目，我才对建筑有了长久的兴趣。本书即是这种热情的产物。

真诚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文明专业教授理查德·朗斯特雷思始终如一地支持我的事业。在众多提供过宝贵协助的人当中，特别感谢以下四人：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威廉·斯拉尼，他从本项目启动伊始就给予支持；历史文献办公室特别项目处处长保罗·克劳森，他是我忠实的支持者；外交建筑局总建筑师帕特里克·柯林斯，他竭尽所能为我提供资料，确保这段历史的准确和完整；外交建筑局前总建筑师查尔斯·赫尔曼，他为我提供了以前未曾审定过的文件和纪要。

感谢建筑师罗伯特·亚历山大、劳伦斯·安德森、爱德华·巴恩斯、罗伯特·贝蒂、让·保罗·卡良、艾伦·雅各布斯、约翰·约翰森、乔治·哈特曼、罗德曼·汉德尔、弗朗西斯·莱斯布里奇、斯图亚特·努普、威廉·梅特卡夫、宫田信昭、大仓达也、约瑟夫·帕森努、拉迪斯拉夫·雷铎、雷夫·雷普森、克罗希尔·史密斯、休·斯塔宾斯、谷口吉生、约翰·卡尔·沃内基、吉罗德·温克勒等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记忆。感谢玛乔丽·贝鲁斯基、多罗茜·古德曼、唐·霍姆塞、凯瑟琳·雅各布斯、唐娜·雷铎、菲利普·威尔的帮助。特别感谢建筑师雷夫·雷普森和约翰·约翰森借给我原始图纸的复印件，感谢 SBRA 事务所和谢普利家族的慷慨协助。

我非常幸运地得以和外交建筑局的七位前任局长交谈过，他们是：利兰·金、詹姆斯·约翰斯东、拉尔夫·斯卡里特、威廉·斯雷顿、理查德·德塔迪安、杰罗姆·托尔森和约瑟夫·塞克斯。曾经给予我帮助的现任和前任外交建筑局官员有詹姆斯·卡宾、萨尔·迪吉亚科莫、威廉·加拉格尔、杰·霍勒兰、阿妮塔·莱尔德、詹妮弗·劳埃德、威廉·麦卡洛、劳·米卡、威廉·迈纳、米歇尔·明顿、罗伯特·帕克、卡尔·派特奇克、保罗·塞雷、凯文·斯宾塞、约瑟夫·托塞特，还有凯文·萨凌，本书的案例分析中融入了他的艺术修饰。与前大使尼古拉斯·萨哥以及三位负责外交安全的助理国务卿——谢尔登·克雷斯、安东尼·奎因顿和埃里克·博斯韦尔的交谈让我获益匪浅。感谢他们以外交官的优雅心境从头至尾回答我无休无止的问题。

由衷感谢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官员和协助我旅行与实地考察的人们，包括罗马的格罗瑞娅·博贝那和玛莎·佐伊；伦敦的布莱恩·卡尔森和史蒂芬·罗伯兹；布鲁塞尔的维多利亚·科尔多瓦；巴黎的杰丽·考恩；慕尼黑的凯瑟琳·库勃和尤金·塔汉；都柏林的让·瑞兰德；东京的威廉·布瑞尔、罗伯特·麦卡勒姆、乔纳森·麦克黑尔、唐娜·赖特；新德里的威廉·帕克和约翰·惠特尼；海牙的亚瑟·伯杰和丹·黑吉曼。感谢前大使罗纳德·帕默，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克罗基特的特别助理托马斯·斯特恩，他们在国务院和国会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建议。

帮助过我的同事、老师和朋友们有劳拉·罗珀、莎莉·卡特勒、彼得·希尔、卡罗尔·克林斯基、理查德·威尔森，以及最早把我引入这一课题的贝茨·劳里。感谢理查德·阿诺德、苏珊娜·贝内特、西蒙·布尔金、克里斯汀·科加、洛伊斯·克雷格、沃尔特·克里斯、加斯顿·雷耶斯、诺玛·埃文森、彼得·费尔古森、约舒亚·弗雷德、埃利奥特·弗罗斯特、威利·希尔、查尔斯·肯尼迪、

里奥纳多·金、贝蒂·金、麦格丽·克莱恩、莫妮卡·克拉博、西伯利·詹宁斯、朱迪思·莱纽斯、劳伦斯·拉金、卡米尔·拉森、安托瓦内特·利、米歇尔·马卡斯、莎伦·麦考利、詹姆斯·米勒、杰弗里·米勒、亨利·米伦、安妮·尼森、露丝·罗斯、罗布·罗、安德鲁·史德曼、罗达·特鲁波夫和彼得·特鲁波夫。感谢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人员——哈佛大学的玛丽·丹尼尔斯，美国建筑师学会的托尼·韦伦。感谢劳伦斯·维尔、伊丽莎白·格罗斯曼、杰夫·科迪、罗恩·鲁宾在调查美国海外机构形象方面做出的先驱性努力。还要感谢我母亲布兰奇·坎特的教诲，感谢苏珊·弗尔斯出色的索引和专业的编辑工作。

格雷厄姆美术研究基金会给予了慷慨赞助，为我在书中收集和再现众多优秀的实例提供了资金。还有韦尔斯利学院的哈里特·肖研究生奖学金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美国研究校友奖学金为本项目提供了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外交研究与培训协会前主席史蒂芬·劳给予本书的肯定。很荣幸能入选外交研究与培训协会、退休外交官联谊会丛书，感谢外交研究与培训协会出版协调员马杰里·汤普森如此恰当地展现了本书和作者。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和编辑马克·兰姆斯特，很高兴能和如此具有想象力和责任心的专业人士合作。

最重要的，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对我的支持使得这一切变成可能。书中最好的照片中有部分出自我丈夫鲍勃·洛菲勒之手，我的儿子吉姆和查尔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诚挚地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耐心、智慧和鼓励。

目 录

序	(i)
中文版序	(iii)
英文版序	(vii)
致 谢	(xi)
绪 论	(1)
第 一 章 早期岁月	(11)
第 二 章 战后扩张	(36)
第 三 章 国务院的现代主义	(59)
第 四 章 美国输出民主	(80)
第 五 章 现代建筑受到攻击	(100)
第 六 章 权力更迭	(125)
第 七 章 建筑咨询委员会	(140)
第 八 章 鼎盛时期	(167)
第 九 章 建筑师坚持己见	(187)
第 十 章 都柏林项目僵局	(219)
第十一章 恐怖袭击目标	(244)
后 记	(270)
附 录 A	(274)
附 录 B	(274)
附 录 C	(276)
附 录 D	(277)
附 录 E	(277)
译者后记	(283)

绪 论

1946年3月,当温斯顿·丘吉尔警告“铁幕”正笼罩整个欧洲时,冷战思维已在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头脑中成型。很快,形势就明朗了。苏联的举动驱使美国卷入了一场没有传统战争边界的冲突。旨在遏制苏联在欧洲扩张的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应对冷战挑战的一个举措,此外还有美国新闻署(USIA)的成立以及大大扩张的外交建筑项目。本书以1926年以后美国在海外建设的使馆为重点,通过外交建筑来寻踪勾勒美国的外交史。书中考察了美国建立驻外机构的最初历程;二战后信心十足的年代,那时的外交建筑项目在规模和关注度上都达到了巅峰;动荡的20世纪60、70年代,政治困惑和不断上升的安全隐忧是那一时期的标志;还有近期恐怖袭击和制约冷战后外交格局的千变万化的国际使命的发展情况。

外交建筑项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界定其世界角色的一种努力。一如旨在增进国际理解并因其友好姿态而广受赞誉的富布莱特教育交流项目一样,新使馆也被外界誉为美国良好意愿与承诺的现实体现,而那些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进入人们视线的现代使馆建筑,亦成为美国公共外交开放性的象征。

使馆是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建筑,是国内政治、国际事务及一系列复杂的外交需求共同制约的产物。作为办公建筑,使馆区别于普通建筑之处不仅在于非同寻常的设计要求和位置,还在于使馆常常有多位业主,而不仅仅是一位。国务院、外交官、国会中的监管委员会、驻在国政府、个别大使,以及美国纳税人都把使馆看做是自己的所有。真正生活工作在使馆中的外交官却常常是对使馆建设进程影响力最小的那部分人。毫不奇怪,使馆项目的建设史充满了竞争与妥协。

美国的民选国会对外交政策至关重要，这与独裁政权不同，与大多数民主国家议会监督外交实践但影响力无几的情况也不同。使馆选址、造价，甚至外观形象的外交决策取决于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角力。要想考察外交建筑项目或使馆建筑，就必须了解民选官员们所起的作用及其行为方式，了解那些看似无关的事件是怎样被政治牵连到一起的。

国会起初采用非税收资金来支付二战后的外交建筑项目，这是对研究外交建筑史有重要意义的线索。1946年至1958年，国务院用二战后的国外信贷资助了绝大多数外交建筑项目，这些信贷来自租借协议、出售剩余房产、战争资产协议，以及经济合作总署的对应基金。这种新颖的资金安排，最初是由国务院外交建筑局（FBO）局长弗雷德里克·拉金提出的，它激活了数以亿计的“冻结”资金，资助了美国使馆、领事办公楼、外交官住房等项目的购地和建设。那时国会的监管极其有限，为建筑创新提供了良机。随着国会越来越多地将这些资金用于军事用途，可供建设使用的资金不断减少，造成新建项目萎缩，产生了针对建筑风格和品味的尖刻论战。

直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美国国会才首次意识到有必要改善其海外的外交机构，此前，美国只是建造了寥寥无几的使馆建筑。对外交建筑的需求在二战前就有，但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才意识到巨大增长的全球利益，也就是在那时才有了大规模进行外交建筑项目的资金。面对二战后对外交办公建筑的急迫需求，外交建筑局建造了数目可观的现代化使馆办公楼，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使馆*。

二战以后，现代主义建筑与自由思想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建筑师成为现代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外交建筑局彻底背弃了国内政府建筑的模式，在二战后首批主要项目中展示了现代建筑。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为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不断扩张的世界地位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感到矛盾。在现代建筑和艺术中同时体现出了骄傲和内疚两种

* 遵循习惯叫法，本书将使馆办公楼称作使馆。使馆一词可以指一个国家所有的驻外代表机构，可以指大使官邸，大使办公室，还可以指大使。在本书中它特别指办公楼，包括领事和外交办公室。书中对办公和居住用房的区别做了交代，官邸也加以了注明。